

廉政学研究 2019 年第 1 辑（总第 3 辑）

第 201 ~ 230 页

© SSAP, 2019

美国公共腐败的测量：来自联邦 起诉行政记录的证据

阿德里安娜·科迪丝 杰夫·瑞米洛

王 阳 翻译*

摘 要：美国公共领域腐败实证研究的文献越来越多，但大多数研究都使用联邦腐败定罪的调查数据。这些数据高度整合但数量很少，其质量和来源都不太可靠。本文介绍了一个来自美国行政记录的替代数据源，该数据源按国家官员类型和主要指控进行统计，提供了更详细和可靠的关于腐败起诉和定罪的信息。与传统观点相反，美国公共领域贪污罪并没有增加，而且大多涉及低级别的联邦或地方官员。关于公共腐败的行政数据与国家年度观察中的调查数据没有高度关联。因此，在对腐败起诉行政记录进行重新审查时，无法得到现成的基于调查数据实证研究的类同的结果。对于对美国公共腐败原因及其后果感兴趣的学者来说，提供更可靠和更详细的腐败起诉数据是件好事。

* 阿德里安娜·科迪丝 (Adriana S. Cordis)，美国温索普大学 (Winthrop University) 教授；杰夫·瑞米洛 (Jeffrey Milyo)，美国密苏里大学 (University of Missouri) 经济学系主任、教授。王阳，1996 年生，浙江温岭人，上海大学上海研究院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廉政学。

关键词：腐败；贿赂；丑闻；国家政治

我有这个，它是金色的。而且……我只是不想白白放弃……如果我没有从奥巴马那里得到任何回报，那么我会朝另一个方向走，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罗德·布拉戈耶维奇州长

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公共腐败”（Public corruption）一词很可能会让人联想到最近联邦政府反腐行动中的典型例子：伊利诺伊州州长罗德·布拉戈耶维奇（Rod Blagojevich）在窃听录音中，吹嘘自己有能力指定一人去填补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空出的参议员职位^①；对加州众议员兰迪·坎宁安（Randy “Duke” Cunningham）调查后，众议院的信纸上列出了联邦合同的金额和相应的回扣清单；^② 马萨诸塞州参议员黛安·威尔克森在胸罩里塞上 100 美元接受贿赂的监控录像^③。媒体以最耸人听闻的方式报道此类高级官员，可能会强化人们对腐败的认知。但是这些案例有多大的代表性呢？在民选官员和高级官员中，腐败是常见的吗？大多数公共腐败案件到底是什么类型的犯罪？尽管美国关于腐败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但像这样的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主要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数据库。

在美国，对于公共腐败的原因和后果的实证研究通常将联邦对“官方腐败”（Official corruption）的定罪数量作为衡量腐败的标准。^④

① 文中引用的布拉戈耶维奇的声明取自 FBI 窃听录音的抄本（Zorn, 2010）。

② 扫描的“回扣清单”由 Eckert（2006）提供。

③ 见“威尔克森监视照片”（2006）。

④ 以下是一些例子：Adsera et al., 2003; Alt & Lassen, 2008, 2014; Berkowitz & Clay, 2006; Campante & Do, 2014; Cordis, 2014; Cordis & Milyo, 2013, 2015; Depken & LaFontain, 2006; Dincer, 2008; Dincer, Ellis & Waddell, 2010; Fisman & Gatti, 2002; Fredricksson et al., 2003; Glaeser & Saks, 2006; Goel, 2014; Goel & Nelson, 1998, 2007, 2011a, 2011b; Goel & Rich, 1989; Hill, 2003; Johnson, Lafontain, & Yamark, 2011; Leeson & Sobel, 2008; Maxwell & Winters, 2005; Meier & Holbrook, 1992; Meier & Schlesinger, 2002; Nice, 1983; Simpson et al., 2012。

在这类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所使用的数据取自司法部公共廉政处（PIN）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根据这些报告，按州挑选出涵盖四十年中大部分时间的年度数据成为可能。此外，官方文件对腐败相关信息披露很少。这两者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对公共腐败的实证研究普遍使用司法部公共廉政处的数据。

Boylan 和 Long（2003）对司法部公共廉政处数据的来源和质量提出了质疑，指出这些数据是根据联邦检察官的回忆来取得必要的情况和资料，而不是直接根据行政记录编制的。然而，其他学者（如 Glaeser & Saks，2006）淡化或忽视了这些担忧，并继续在他们的研究中使用司法部公共廉政处的数据。^① 本文将更为详细可靠的官员腐败行政数据与普遍使用的司法部公共廉政处数据进行了比较。在比较过程中，对 Boylan 和 Long（2003）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肯定，但对他们其他的观点则予以了批驳。然而，我们发现了与司法部公共廉政处数据相关的更严重的问题。简而言之，司法部公共廉政处数据生成过程高度可疑，而且文档记录很差；因此，许多学者在使用这些数据时，对其测量的具体内容没有充分的理解，这并不奇怪。因此，对于早期使用司法部公共廉政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的关于美国以往腐败的经验教训，应该用更高质量的行政数据进行复审检验。^②

在将案件提交给联邦检察官时，该联邦地区的美国助理律师记录了提交的详细信息，并将其分类进行编码，其中的一个类别就是“官方腐败”。美国检察官执行办公室（EOUSA）将“官方腐败”定义为对公职人员的刑事起诉，“对公职人员的不当行为或滥用，包括私人企图贿赂或以其他方式腐败公职人员”。尽管任何此类分类本身都是主观的，

① 一个著名的和最近的例子，见 Campante & Do（2014）。此外，关于腐败的 PIN 数据经常在大众媒体上报道；最近的例子包括 Kushner（2010）、Maciag（2012）、Maddigan（2013）、Marsh（2008）和 Wile（2013）。

② Cordis 和 Milyo（2015）重新审查了 Leeson 和 Sobel（2008）的调查结果，即联邦灾害援助导致公共腐败加剧。

但这些行政记录具有电子记录的优势,并随着案件在联邦司法系统进行而不断更新。Boylan 和 Long (2003) 从联邦司法统计资源中心 (Federal Justice Statistics Resource Center, 简称 FJSRC) 获得了这些定罪行政记录的摘要。遗憾的是,从 2001 年开始,该中心改变了分类制度,不再具体识别公共腐败案件。^①但是,这些管理记录中的信息可以通过事务记录访问交换所 (Transactional Records Access Clearinghouse, 简称 TRAC) 访问,这是一个致力于促进公众访问联邦数据的非盈利组织。^②《信息自由法》的请求被 TRAC 用来收集大量最新的政府记录;这些信息可供公众使用,尽管许可证有限但价格较为合理。^③

迄今为止,只有少数研究利用了 TRAC 提供的有关官方腐败的行政记录。Cordis 和 Warren (2014) 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们研究了《信息自由法》对官员腐败的影响。此外,Alt 和 Lassen (2014) 研究了联邦检察官的行为,Cordis 和 Milyo (2013) 预估了州竞选财政改革对州腐败的影响,Cordis 和 Milyo (2015) 研究了联邦灾害援助是否在受影响地区引发腐败。然而,由于很少有实证研究使用 TRAC 数据,本文描述了该数据源相对于司法部公共廉政处数据的一些优势。

很少有人知道构成美国官方腐败的犯罪频率和类型。本文利用 TRAC 提供的有关公共腐败的详细信息来进行这种描述。由此得到的一个有趣的结论是,与人们普遍的看法相反,像被报道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黛安·威尔克森之类的腐败案件是很少的;相反,典型的公共腐败案件显然不那么淫秽。大多数案件似乎涉及非选举官员和下级官员的盗窃 (stealing) 和说谎 (lying)。

然而,在详细描述公共腐败定罪之前,首先考虑衡量腐败的替代措施

① 有关 FJSRC 数据的在线数据字典,请访问 http://www.bjs.gov/fjsrc/data_dictionary.cfm?refrom=ui/datadictionary.cfm。

② 有关 TRAC 为确保数据质量而采用的策略的讨论,请参阅 Long、Roberge、Lamicela 和 Murgesan (2004)。

③ 有关 TRAC 可用数据的说明,请参阅事务记录访问清算所 (N. D.); 有关获取许可证的信息,请访问 http://tracfed.syr.edu/notices/fee_schedule.html。

以及支持和反对将定罪作为衡量腐败的一些论据是有益的。Boylan 和 Long (2003) 提出了三个关于联邦定罪作为腐败衡量标准的观点：(1) 联邦数据不包括州和地方一级起诉的腐败；(2) 联邦当局可能夸大或错误地将毒品案件归类为官方腐败；(3) 为了回应州的起诉，各州的检察工作可能会系统地发生变化。

一 腐败的客观和主观测量标准

“公共腐败”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它可以最简单地定义为“滥用公职谋取私利”，或者更广泛地定义为“滥用公共信任” (Meier & Holbrook, 1992)。^① 前一种定义的优点是，通过官方犯罪统计数据，可以方便地进行客观衡量，而“滥用公众信任”的定义则更模糊和主观。因此，通常通过专家排名或对腐败程度或政府整体信任度的问卷调查来间接衡量政府中滥用公共信任的情况。^② 即便如此，大多数采用腐败主观衡量标准的研究都将其视为腐败犯罪活动的指标。^③

当然，公共腐败的证据可能没有完全留存在官方记录中，因为一个对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府可能不会像对待其他类型的犯罪那样花费精力和资源来追查腐败。在比较各国的腐败时，由于各国在法律标准、检察资源、记录保存习惯和公众获取记录的渠道上存在差异，这给比较各国腐败的研究带来了很大挑战。基于这些原因，各国对腐败往往

① Nye (1967) 将腐败描述为“由于私人关系（个人、亲密家庭、私人集团）金钱或地位收益而背离公共角色的正式职责的行为；或违反禁止某些类型私人关系影响力行使的规则”。Shleifer 和 Vishny (1993) 将其描述为“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Rose Ackerman (2002) 确定腐败活动与“向公共代理人非法支付款项，以获得在没有支付的情况下可能应得或不应的利益”。

② 有几个这样的国际指数可供研究人员免费使用：由透明国际编制的腐败感知指数 (<http://www.transparency.org/research/cpi/overview>)、腐败控制指数 (Kaufmann, Kray, & Mastruzzi, 2010) 和由遗产基金会编制的腐败自由指数 (<http://www.heritage.org/index/freedom-of-corruption>)。

③ 关于最近对有关腐败的学术文献的调查，请参阅 Treisman (2007)。

依靠专家的主观调查或公众的态度来衡量。^①

原则上,在检查美国政府的腐败行为时,也可能会遇到上述类似的挑战。然而,美国的实际做法大大降低了难度,因为美国几乎所有的官方腐败案件都由司法部内的独立联邦检察官处理,并在联邦法院按照一致的法律标准进行审判 (Glaeser & Saks, 2006; Goel & Nelson, 2007, 2011a)。

(一) 联邦当局真的会起诉大多数腐败案件吗?

对于文献中一再声称“联邦起诉无处不在”的说法,唯一的外部支持证据来自罗素·莫赫比伯 (Russell Mokhiber),一位自我标榜为进步主义的活动家和《企业犯罪报告》(一份法律通讯)的编辑。^②莫赫比伯在《企业犯罪报告》(“Public Corruption”, 2004, 2007)中引用了自己的话,他说:“绝大多数的公共腐败起诉可能有 80% 是由联邦官员提出的。”^③但莫赫比伯的判断没有原始来源,也没有对有关其来源的重复询问作出回应。因此,有必要探讨莫赫比伯经常引用的判断(无论如何得出)是否可信。

州和地方检察官所追查的腐败案件没有被司法部记录在案,因此不会在 PIN 数据或 TRAC 数据中显示出来。为了了解此类起诉的频率(频次、数量),我们运用 Lexis-Nexis 系统对 1986~2014 年所有报纸和新闻网关于政治腐败和丑闻的报道,以及与贿赂、阴谋、贪污、欺诈、回扣和挪用有关的术语进行了检索。随后,对检索出来的新闻报道进行了核查,以确定它们是否是对联邦或非联邦公职人员的起诉。这样一个覆盖

① 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各国的公共部门腐败阻碍了贸易,降低了经济增长,扭曲了政府支出的分配,并造成了经济效率低下和不平等 (Baraldi, 2008; Brunetti, 1997; Fisman & Svensson, 2007; Gupta, de Mello & Sharan, 2001; Gyimah Brempong, 2002; Hessami, 2010; Johnson, Lafontain, & Yamarik, 2011; Lambsdorff, 1998, 2003; Leite & Jens, 2002; Li, Xu, & Zou, 2000; Mauro, 1995, 1996, 1998; Murphy, Shleifer, & Vishny, 1993; Swaleheen, 2011; Tanzi & Davoodi, 2002)。

② 见 <http://www.commondreams.org/author/russell-mokhiber>。

③ 在“Public Corruption” (2004) 和“Public Corruption” (2007) 中提供了相同的引用。

范围广泛的系统就被建立起来，这包括了所有公职人员，而不仅仅是高级官员。^① 即便如此，这项工作也只能记录由非联邦法院判定、可能被归类为公共腐败的总计 910 起犯罪。相比之下，1986 ~ 2014 年，TRAC 数据库中记录了 16452 起由联邦法院判处的犯罪案例。910 起犯罪中，232 起案件是州政府雇员实施的，最常见的是汽车牌照局（motor vehicle licensing bureau）职员出售牌照以及大学职员、州警察和狱警的盗窃（thefts）行为。剩下的 678 起案件是地方政府雇员实施的，最常见的案件包括公立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当地警察和消防人员的盗窃（thefts）。这些调查结果表明，1986 ~ 2014 年联邦检察官处理的公共腐败案件的比例上限约为 94%。^② 当然，只有最轰动的起诉才有可能在新闻报道中被报道（尤其是涉及低级别的公职人员），因此这一行动不能为联邦当局所追查的腐败案件的比例设定一个下限。因此，尽管大多数公共腐败案件由联邦检察官处理似乎是合理的，但在解释州和地方官员的联邦定罪时必须谨慎。

（二）统计数据中是否包括无关的毒品案件？

Boylan 和 Long（2003）还提出了一种担忧，即被归类为官员腐败的一系列犯罪可能包括毒品指控或其他与滥用公职或滥用公共信任远不相关的犯罪。Alt 和 Lassen（2003）对此表示关注，尽管没有进一步阐述。

司法部公开提供的行政记录并不能对被告个体进行识别。因此，不能将这些记录独立地归类为公共腐败；相反，学者必须依赖检察官所做的编码。在提交起诉时，联邦检察官根据每个案件的主要指控和细节，

① 例如，佛罗里达州地方当局起诉的一宗贿赂案导致 Tamara Tootle 女士提出了一项缺乏竞争的抗辩，她是一名中学教师，每天向学生收取 1 美元的费用，以避免参加体育课。

② 被定罪的例子是约翰·博伊尔，他从伊利诺伊州收费公路管理局偷了 400 万美元。博伊尔也是一个当地官员在联邦法院因腐败被定罪的例子。离开监狱后，博伊尔被芝加哥市市长理查德·M·戴利（Richard M. Daley）雇用；后来，他又因受贿向货运公司授予城市合同而被定罪（“Guilty Plea”，2005）。

将案件分为 11 大类 (如移民、麻醉品、武器、有组织犯罪、白领犯罪、官员腐败等)。这种编码方式为偶然甚至有目的地对案件进行错误分类留下了空间, 因此引发了对毒品案件被列入官方腐败统计数据之忧。

Boylan 和 Long (2003: 422) 仅提供了一个这样定罪的例子, “一名前司法部长助理因使用和持有可卡因而被起诉”。然而, 这个描述并不十分准确或完整; 事实上, 这个故事还有更多的内容。^① 被讨论的人, 亨利·巴尔, 是宾夕法尼亚州政治家、前美国司法部长迪克·桑伯格 (Dick Thornburgh) 的长期助理。巴尔本人曾是宾夕法尼亚州的联邦检察官和副总检察长, 在担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期间曾担任桑伯格的副法律顾问和后来的总法律顾问, 最后在桑伯格作为美国总检察长期间担任其特别助理。但他在华盛顿加入桑伯格团队后不久, 就涉嫌与发生在哈里斯堡的一次毒品突击检查有关, 警方在这次毒品突击检查中发现了毒品和一把乌兹机关枪。随后的法庭证词指控巴尔数年来 (包括在他担任州长总法律顾问期间) 购买和使用可卡因。他最终被判犯两项罪名——向司法部作虚假陈述, 以及持有和阴谋使用可卡因。因此, 这起案件被归为官员腐败的原因并不奇怪。亨利·巴尔为了在司法部获得一个高级职位而撒谎。之后, 作为一名联邦官员, 他又向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撒谎。

巴尔案当然符合“滥用公众信任”的描述, 但这一事件是否代表滥用公职可能仍具争议性。因此, 这一案件有助于说明检察官在将案件归类为官员腐败时做出主观判断的可能性。当然, 这只是一件逸事。在下一节中, 提出了更系统的证据, 证明官方腐败定罪包括极少数的毒品指控。事实上, 只有 2% 以上的联邦公共腐败定罪是与毒品有关的犯罪, 只有 0.1% 是简单地占有毒品。相反, 大多数官方腐败案件涉及贿赂、回扣、贪污或盗窃公共财产 (即与公务更密切相关的活动)。

^① 亨利·巴尔的职业生涯和罪行在几个媒体报道中都有描述, 这些报道来源于 Lewis (1991a, 1991b)、Biddle 与 Lounsbury (1990)。

（三）对 PIN 数据的误解

Boylan 和 Long (2003) 也做了一个重要的观察，之前的研究都没有承认这一点（从那以后也很少发现这一点），也就是说，大多数学者使用的 PIN 数据不是行政数据（administrative data）。相反，司法部的公共廉政部门在 3 月调查了美国地区检察官在上一个年度腐败案件中的活动。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地区检察官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准确完成这些调查是一个高度优先事项（例如，并非所有地区办事处都遵守，有些答复是手写的）。

关于 PIN 数据的一个常见误解是，公共腐败定罪主要是由民选或高级公职人员构成的。^① 然而，司法部定义的“官员腐败”包括政府雇员，而不仅仅是民选官员。此外，公共廉政处明确指示检控官将涉及低级别公职人员的较轻微事件包括在内，而这些低级别公职人员在本署的记录中并未被列为腐败官员。因此，Boylan 和 Long 对 PIN 报告的官方腐败案件的质量和构成提出质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许多学者在使用这些数据时，并未详细了解实际测量的内容或数据生成过程的性质。

（四）检察工作

Boylan 和 Long (2003) 也担心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是联邦起诉偏见的来源。他们认为，联邦检察官可以代替州或地方检察官，他们可能有不同的偏好，在不同类型的犯罪中分配其有限的资源。然而，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N. D.）将打击官员腐败列为其首要刑事事项。这意味着那些不按联邦调查局要求办案行事的渎职检察官

^① 例如，为了比较各州的腐败率，Adsera、Boix 和 Payne (2003: 1059) 根据一个州当选官员的数量对定罪进行了量表 (Alt & Lassen, 2008; Meier & Holbrook, 1992)。此外，Glaeser 和 Saks (2006: 1059) 根据政府就业情况对各州的定罪情况进行了量表，但补充道，“理想情况下，我们会将腐败率计算为相对于公职人员总数的定罪数量，但这些数据在整个样本期内均不可用”。

本身可能成为调查对象。^① 除此之外, 联邦检察官还有强烈的积极动机来追查腐败案件。大多数被归类为官员腐败的犯罪被司法部指定为国家优先事项 (这是最高优先事项)。如果这还不够, 成功的反腐败斗士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政治前景将会更好。举两位前美国律师从政的例子, 前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和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 (两人在不同的时间都有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基于这些原因, 自私自利和具有公共服务意识的联邦检察官可能会在打击腐败方面做出高度努力。

尽管如此, 检察工作无疑是证明公共腐败严重度的一个潜在因变量, 这是否以及会在多大程度上在腐败研究中产生偏见取决于环境。例如, 如果没有任何遗漏的检察工作的系统决定因素, 研究人员可以自信地研究腐败与其他腐败外生决定因素 (exogenous determinants of corruption) 之间的简化关系。但是, 研究人员有责任调查由于检察官未尽职责而可能产生的内生性偏差 (endogeneity bias), 特别是当检察官不受经济激励或意识形态影响时。例如, Boylan (2004) 调查联邦检察官对金融激励的反应, 而 Gordon (2009) 则探讨了起诉可能部分受政治因素推动的说法。其他最近明确考虑检察工作内生性的包括 Boylan 和 Long (2003)、Alt 和 Lassen (2014)、Cordis 和 Milyo (2013) 的研究。^②

二 关于腐败定罪的 PIN 和 TRAC 数据

在美国, 最广泛使用的公共腐败衡量标准来自公共廉政部门向国会

^① 参见 <http://tracefed.syr.edu/help/codes/progcode.html>。所有涉及联邦雇员的官方腐败案件都被列为国家优先事项, 涉及高级国家官员的案件也被列为国家优先事项 (“州长、立法者、部门或机构负责人、法院官员、决策层或管理层的执法官员或其工作人员”) 以及当地官员 (“市长、市议会成员或同等人员、市经理或同等人员、部门或机构负责人、法院官员、决策或管理层的执法官员或其员工”)。

^② Boylan 和 Long (2003) 使用司法部记录的联邦检察官报告的时间分配作为工作的代表; 他们还使用了州政府记者对检察工作的观点。其他几项研究使用执法或司法支出作为工作的代表 (例如, Cordis & Warren, 2014)。Cordis 和 Milyo (2013) 利用 TRAC 数据集的丰富性, 将联邦官员的起诉作为起诉州官员的代表。

提交的年度报告中公布的刑事定罪数据；然而，似乎很少有学者认识到，更不用说承认，这些数据来自调查。公共廉政处是司法部内的一个机构，美国检察官（EOUSA）的执行办公室也是如此，它在 94 个联邦司法区（每个州至少有一个司法区）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独立的美国地区检察官及其工作人员。美国地区检察官处理几乎所有的联邦腐败案件，尽管当存在利益冲突或涉及联邦法官的案件时，PIN 提供协助，有时接管调查和起诉。例如，2007 ~ 2011 年，PIN 每年处理 40 ~ 60 项定罪，占 PIN 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所有腐败定罪数量的 4% 左右。^① 其余 96% 的定罪通过每个司法区向 PIN 提交调查报告。^②

公共廉政处成立于 1976 年，自 1978 年以来，它向国会提交了年度报告，描述了联邦腐败定罪的汇总数据，这些数据按官员类型（联邦、州、地方）或联邦司法区分类，但不同时按这两种分类（见向国会提交的 PIN 年度报告中的表 2 和表 3）。联邦司法区完全在州和领地边界之内或与州和领地边界一致，因此可以直接从 PIN 年度报告中构建关于定罪的州级数据系列。这是大多数学者用来衡量各州腐败的数据来源，也是同样的研究不能按州来区分地方或州官员腐败率的原因。

如上所述，联邦检察官在提交可能的起诉时对每一个案件都进行了编码；“官方腐败”是指联邦法院、州或当地公职人员因官方不当行为（official misconduct）或滥用职权（misuse of office）而受到的任何起诉。1992 年以来，EOUSA 发布了一份年度统计报告，按财政年度划分的官方腐败案件总数列在这些年度报告的表 3 中，尽管没有按地区划分。最后，TRAC 拥有一个联邦起诉数据库，其中包括这些相同的编码名称；TRAC 数据是从 1986 年起根据《信息自由法》向司法部提出的请求形

① 见 2007 ~ 2011 年向国会提交的 PIN 年度报告的表 4。从 1993 年到 2006 年，该组织每年处理大约 42 起案件（Department of Justice, 2008）。

② 在 2000 之前，并非所有的美国律师事务所都响应 PIN 调查，所以许多学者只是通过对相邻地区的缺失值进行线性插值来填补缺失数据（例如，Geleaser & Saks, 2006）。

成的, 涵盖了司法部所提供的所有联邦起诉。^①

TRAC 数据可以在被告层面进行分析, 尽管司法部没有发布任何识别信息 (甚至人口统计信息)。但是, 可用的详细信息包括移交、归档和处置、移交机构、判决和罚款的日期, 以及按《美国法典》标题和章节划分的主要费用。此外, 官员腐败案件也按腐败涉及的官员类型 (联邦、州、地方或与腐败行为有关的私人) 进行编码。因此, TRAC 数据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这些信息并未包含在来自 PIN 或 EOUSA 的汇总数据中。

(一) PIN 数据中的矛盾

PIN 数据中的第一个异常是 1980 年之前的腐败定罪总数。每个 PIN 年度报告都包含一个表, 列出了几年来每年的总定罪情况; 但是, 各报告之间的总数变化却没有解释 (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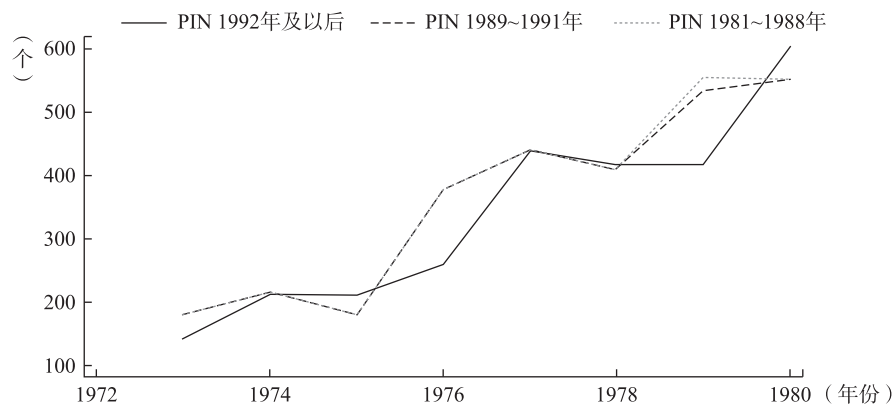


图 1 公共廉政处报告的官方贪污罪数目的变化

说明: 这三个系列均来自美国司法部公共廉政处 (PIN) 发布的年度国会报告表 2。

第二种异常情况如图 2 所示, 它比较了四种不同来源报告的年度总定罪情况。同一份年度报告中不同表格中所报告的定罪的 PIN 数据与应有的数量不相符。根据 PIN 年度报告表 2 (按官员类型列出) 和表 3 (按联邦地区列出) 构建的年度总定罪系列存在显著差异, 并表现出剧

^① 上诉案件的结果在 TRAC、EOUSA 或 PIN 数据中不可用。

烈的波动，仅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变得更加稳定和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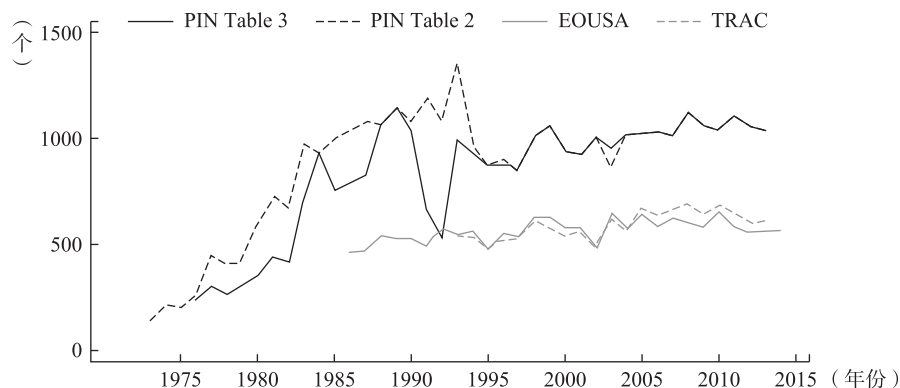


图 2 美国的官方腐败数量

说明：这四个系列都来自美国司法部，但在涉及机构方面有所不同。PIN = 公共廉政处；表格编号确定了向国会提交的 PIN 年度报告中的表格，从中获得数据。TRAC = 锡拉丘兹大学 (Syracuse University) 的交易记录交换所 (Transactional Record Clearinghouse)；本数据每列是根据美国司法部的多项信息自由法要求汇编而成 (该数据的使用得到了 TRAC 的许可)。EOUSA = 美国地区律师执行办公室 (Executive Office of U. S. District Attorneys)；数据取自 EOUSA 年度统计报告表 3。

为了解释这些不一致之处，我们已经与司法部以及几名在任和前联邦检察官进行了多次正式和非正式的调查。对 PIN 数据的不一致性和波动性唯一的解释来自一位美国律师，他透露联邦检察官可能与 PIN (司法部内的一个竞争和平行单位) 有着不稳定的关系，因此可能不会把精确完成调查看作一项重要任务。然而，这一 (或任何其他) 解释又不可能得到证实，主要是因为没有现任官员会谈论 PIN 记录中的异常情况。^① 事实上，司法部不仅对调查没有反应，而且从其网站上删除了记录这些异常情况的所有历史年度报告。^②

① 作者已将一套完整的 PIN 年度报告存档给国会供子孙后代使用。

② PIN 报告中还有另一个不一致之处。2007 年之前，年度报告并未列举仅由 PIN 处理的所有案例，也没有迹象表明这些案例是否包含在报告总数中。2007 ~ 2011 年，PIN 处理的案件在年度报告的新表 4 中单独列举，但没有迹象表明这些案件是否也包括在其他表中。2012 年，PIN 报告指出，所有腐败总数现在都包括 PIN 处理的案件，但之前的报告没有包括这些案件。然而，2012 年报告中所有前几年报告的总数与前几年报告中相同。可以说，PIN 报告中的数据文档既不充分又矛盾；这是在未来的实证工作中避免使用 PIN 数据的另一个原因。

图 2 中另一个明显的谜团是, 相较 EOUSA 或 TRAC 数据而言, PIN 数据几乎总是显示有更多的腐败指控。这是因为 EOUSA 和 TRAC 只报告同时被联邦检察官编码为“官方腐败”的案件; 相反, PIN 调查要求检察官根据更广泛的腐败定义对年度活动进行回溯。1983 年以来, PIN 调查已明确要求调查主体报告低级公职人员(包括邮政雇员)的犯罪行为——这些行为在其他方面未被编码为官员腐败。^① 值得注意的是, 在 1983 年之前, 年度 PIN 数据系列至少彼此高度相关, 而且可以说更符合随后从 EOUSA 和 TRAC 得出的定罪趋势。

图 3 显示了参与公共腐败的官员的分类, 来源于 PIN 所汇总的数据。1983 年联邦腐败数量的激增, 与检察官关于将因盗窃或破坏邮件而被定罪的邮政雇员在内的低级别官员囊括在计算范围内的要求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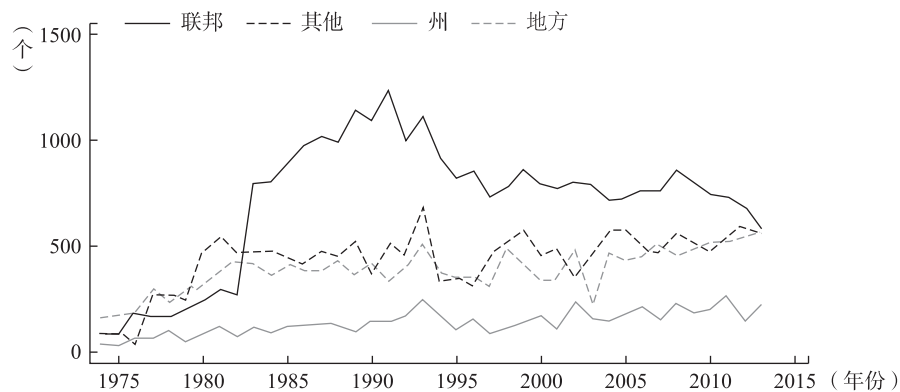


图 3 按官员类型划分的联邦定罪 (PIN) 数量

(二) 审查 PIN 调查

作者提交了按照《信息自由法》(FOIA) 的要求, 在过去几年完成的 PIN 调查的副本。然而, 经过 3 年的处理, 仅收到来自 14 个联邦

^① 这一做法记录在 1983 年提交国会的 PIN 年度报告表 3 的脚注中。

区 2006 年的一些可用调查（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由 PIN 生成的文件都被过度删减，以致不能得到有效信息）。^① 然而，对这一有限样本的检查确实揭示了 PIN 和 EOUSA/TRAC 报告的总定罪率的差异。虽然所有有关被告的信息都已从这些报告中删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观察到涉及腐败起诉官员所在雇佣机构的名称。但是，由于调查中的具体日期也被修订（并且 PIN 数据是在日历年而不是财年报告的），因此无法直接将原始调查的总额与 EOUSA 或 TRAC 的管理记录进行比较。

PIN 调查的原始样本显示，在 14 个地区共 166 项定罪中，至少有 31% 是针对邮政员工的犯罪（一些雇主信息被修改）。此外，被判有贪污罪的联邦官员中，至少有 74% 是被指控盗窃邮政服务财产或破坏、妨碍、盗窃邮件的邮政雇员。如果这类案件涉及更高级别的邮政官员，联邦保护主义者就将其归类为官员腐败；然而，这并不是常见的情况。总的来说，1986 ~ 2014 年所有涉及联邦官员的官方腐败案件中，只有 5% 的案件涉及官员或雇员窃取或销毁邮件（见表 1）。因此，尽管 PIN 调查的样本非常有限，但它进一步揭示了在 PIN 数据与 EOUSA/TRAC 数据中全部腐败案件之间的很大一部分差异涉及邮政工作人员对美国邮件的盗窃、破坏和延迟。

并且，由于检察官填写 PIN 调查，邮政犯罪被归为官方腐败的可能性实际上相当大，至少相对于编码为官方腐败的案件而言。1986 ~ 2014 年，有大约 16500 起因官员腐败而被定罪的案件，有超过 28000 起因邮政犯罪而被定罪的案件和 6000 多起因官员或雇员盗窃或破坏邮件而被指控的案件（《美国法典》第 18 编第 1709 条）。^② 因此，关于公共腐败的 PIN 数据不仅包括联邦检察官将低级别雇员的大量非法行为编码为公

① 司法部两次驳回了作者的《信息自由法》请求。尽管该申请已获该署批准，并已支付影印文件的费用，但作者仍被迫就缺乏对该文件要求的及时、完整和准确答复提出正式上诉。这段插曲也许能让人们了解到国会监督委员会在从司法部获得信息方面的困难，但更重要的是，它并不能很好地预示在后续研究中使用这些原始调查数据的可行性。

② 作者根据 TRAC 数据进行的计算。

共腐败,而且这些附加案件可能主要涉及被盗或延误的邮件。^①

为了进一步检查全部 PIN 定罪与全部 EOUSA/TRAC 定罪之间的差异来源,我们对 2010~2012 年美国公职人员因为腐败相关犯罪被联邦起诉的报纸和新闻网账户进行了搜索调查。^②如果 PIN 数据实际上包含了数百个从 TRAC 数据中省略的引人注目的定罪,那么一些证据应该在新闻报道中体现出来。然而,在任何州或年份的新闻报道中都没有发现。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在从 PIN 获得的调查样本中,关于药物指控的实例非常少。166 起案件中只有两起是根据《美国法典》第 21 条(食品和药品)的规定被判毒品罪的,其中一起案件是单纯的占有。另外 8 起案件涉及根据第 18 条(犯罪和刑事程序)被定罪为“阴谋使用制服运送可卡因”的军事人员。当然,有些官员因做出虚假陈述或其他罪行而被判腐败,很可能与毒品有关,正如上文所述的亨利·巴尔(Henry Barr)案。然而,本次 PIN 调查样本中的实际药物指控案例缺乏,并与一项对 1986~2014 年腐败定罪的更为系统的审查保持一致(见下文)。

三 美国的公共腐败

公共腐败在美国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尽管 Glaeser 和 Goldin (2006)认为,美国的腐败案数量在过去 150 年里一直在下降,近几十年来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低。从 TRAC 数据中得出的定罪数据的时间趋势更符合历史研究而非大众所认为的,因为在过去 20 年中,即使政府官员人数增长,腐败犯罪也没有持续增长(见图 2)。

同样,有关高级民选官员陷入腐败起诉的新闻头条也不能代表绝大多数官方腐败案件。例如,贝辛格(Basinger, 2013)仅确定了自 1974

^① 关于欠发达国家邮政腐败的一个有趣的实地实验,见 Castillo 等(2014)。

^② Lexis Nexis 在 2010~2012 年从每个州搜索新闻账户;搜索参数包括与政治腐败和丑闻以及贿赂、阴谋、贪污、欺诈、回扣和挪用有关的术语。

年以来涉及国会议员的 29 起刑事腐败丑闻；相比之下，TRAC 数据确定了自 1986 年以来联邦雇员的 9000 多起腐败定罪。此外，对 1986 ~ 2014 年的新闻报道的搜索显示，联邦政府官员的所有定罪中，约有 11% 涉及民选或高级官员。总而言之，联邦和州选举或高级官员定罪占联邦和州雇员所有定罪的 2%。

此外，虽然以前的许多研究都使用国家的官方腐败总定罪来审查国家级腐败，但实际涉及国家官员的腐败案件却相对较少。图 4 按官员类型描述了定罪情况。平均而言，腐败定罪中只有不到 10% 是国家官员或雇员（或者每个州每年多一点）腐败。毫不奇怪，联邦官员和雇员的定罪是最常见的犯罪，占有所有定罪的 56%。地方官员腐败一直是第二类最常见的腐败，占 1986 年以来所有官员腐败案件总数的 25%。只有地方官员的定罪显示出强劲的趋势，这些案件自 20 世纪初以来一直在上升，现在占有所有腐败定罪案件数的 30% 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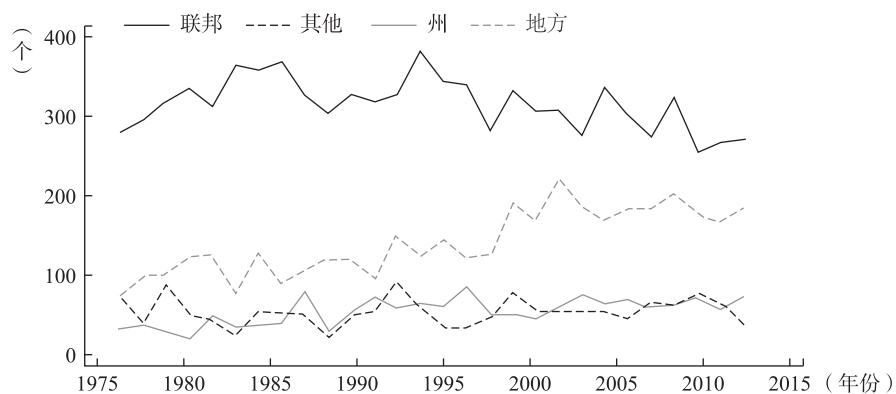


图 4 按官员类型划分的联邦定罪 (TRAC)

(一) 腐败指控的类型

表 1 描述了 1986 ~ 2014 年按主要指控和每种官员类别划分的腐败定罪情况。几乎所有的定罪都是根据第 18 篇（犯罪和刑事诉讼）的主要指控，最常见的具体指控与贿赂、共谋、贪污、虚假陈述和盗窃有关。如上所述，在公职人员中，毒品指控是罕见的，在官方的腐败指控

中,几乎从未出现过。有趣的是,尽管人们普遍关注,但与选举有关的犯罪却十分罕见。1986~2014年,只有49起官方腐败案件被指控与否决或剥夺投票权有关。^①

表 1 主要指控下的政府官员腐败

美国法规中的主要指控	公职人员类型				
	全部	联邦	州	地方	其他
定罪总数	16452	9101	1591	4170	1590
第 18 篇: 犯罪和刑事诉讼	91.4%	92.6%	90.0%	92.2%	83.8%
第 201 条 贿赂公职人员和证人	13.7	20	2.3	3.4	16.2
第 371 条 共谋犯罪或诈骗美国	8.7	9.4	8.1	8.0	7.0
第 641 条 公共资金、财产或记录	7.4	11.8	1.4	1.5	3.5
第 666 条 在接受联邦资金的项目中盗窃/贿赂	10.5	4.4	15.7	22.9	7.6
第 1001 条 在陈述或一般条目中欺诈和弄虚作假	4.6	6.6	1.9	1.5	3.9
第 1028 条 相关身份证明文件的欺诈	1.1	0.4	4.2	0.8	3.0
第 1341 条 邮件欺诈、欺诈和诈骗	5.5	1.9	11.9	11.0	5.7
第 1709 条 官员或雇员盗窃或销毁邮件	3.2	5.6	0.1	0	0.8
第 1951 条 《霍布斯法案》	9.8	1.7	25.3	20.9	11.8
第 1962 条 RICO 禁止的活动	2.2	1.8	2.6	2.9	2.1
18 USC 以下最频繁部分的小计	66.7	63.5	73.7	72.9	61.5
第 21 篇: 食品和药品	2.6%	1.2%	3.7%	3.3%	7.4%
第 841 条和第 843 条 药物的制造和分销	0.9	0.6	1.4	0.9	1.8
第 844 条 简单持有毒品	0.1	0	0.4	0.1	0.1
第 846 条 企图和阴谋	1.3	0.3	0.9	2.2	5.4

① 作者根据 TRAC 数据进行的计算。

续表

美国法规中的主要指控	公职人员类型				
	全部	联邦	州	地方	其他
21 USC 以下药物指控的小计	2.3	0.9	2.6	3.2	7.2
第26篇：国内税收法规	1.4%	1.1%	1.6%	2.3%	0.9%
第7201条 逃税	0.4	0.1	0.4	0.8	0.4
第7206条 欺诈和虚假陈述	0.5	0.2	0.9	1.1	0.2
第42篇：公共卫生和福利	1.1%	1.0%	1.6%	0.6%	1.8%
第408条 SSDI 处罚（残疾人社会福利保险）	0.6	0.8	0.3	0.2	0.4
第1973条 否决或剥夺投票权	0.3	0	1.3	0.3	1.0

资料来源：TRAC 数据。

注：数据是 1986 ~ 2014 年累积的；所有百分比均指列总计，并四舍五入保留一位小数。

“其他”是指参与到官员腐败中的个人，包括 8 起未指明行为的案件。

主要指控的构成因官员的类型而异。《霍布斯法案》最常针对州和地方官员，于 1951 年通过，旨在打击敲诈勒索和工会腐败，禁止以抢劫或敲诈勒索等方式影响州际或国外商业。在公共腐败案件中，当公职人员打着“权力名义”获得他或她无权享有的财产或报酬时，该法令也适用。^① 因此，与贿赂相比，《霍布斯法案》中检察官追查公职人员的举证责任要低一些；这是因为受贿者必须提供服务，而《霍布斯法案》则禁止仅仅由官员收取报酬（试图或有意识地这样做）。^②

联邦和非联邦官员腐败指控构成上的差异引起了人们对将这些案件混为一谈的任何腐败措施的担忧（几乎所有以前的研究都是这样）。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些案件的可比性，有必要对与之相关的监禁判决进行审查。

① 美国律师犯罪资源手册见：<http://www.justice.gov/usam/criminal-resource-manual-2404-hobbs-act-under-color-official-right>。

② 对民选官员的竞选捐款有一个例外，最高法院要求，即使适用《霍布斯法案》，也要有证据表明存在平衡。（McCormick 诉美国，500 U. S. 257，1991）。

(二) 贪污罪的刑期

从 1992 年开始, TRAC 数据还包括与定罪有关的监狱刑期信息, 因此可以按严重程度衡量定罪计数。腐败案件处理情况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虽然不同类型的官员在腐败案件中的定罪率相似, 但州和地方官员更有可能获得监禁和更长的刑期。以任何监禁判决为条件, 非联邦官员的预期刑期比联邦官员长 (大约分别为 26 个月、13 个月)。这意味着, 将所有类别的官员的定罪加起来, 可能会与州一级的腐败的情况产生偏差, 特别是因为联邦官员占了被判腐败政府官员的大多数。

表 2 腐败案件处理情况

	公职人员类型			
	联邦	州	地方	其他
定罪率, 1986 ~ 2014 年	83%	83%	85%	81%
庭审的平均天数, 1986 ~ 2014 年	505	681	686	569
宣判有罪后进行监禁判决的比例, 1992 ~ 2014 年	34%	57%	56%	45%
监禁平均月数, 1992 ~ 2014 年	13	26	27	21

资料来源: TRAC 数据。

注: 1992 年以前没有关于服刑的信息。

在比较各州的腐败时, 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是, 有些检察官可能只追查最严重的腐败案件 (其中许多案件导致监禁), 而其他检察官则可能追查较小的案件 (其中很少有案件导致监禁)。这意味着不同州和年份的定罪与服刑之间的相关性很低。然而, 这些备选的腐败措施之间的相关性为 0.81 (仅对州政府官员关注度的相关性为 0.82)。

(三) 腐败与定罪的时间

Dincer 和 Fredriksson (2013) 指出, 之前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从腐败实施到被发现之间的时间延迟。虽然通常不知道非法活动的确切时间和持续时间, 但可以在 TRAC 数据中观察到刑事移交和定罪の日

期。联邦官员从被移交到定罪的平均时间延迟约为 1.4 年，州和地方官员平均时间延迟为 1.7 年。据推测，这一区别反映了案件办理中，联邦当局起诉非联邦官员有关犯罪的时间延迟更严重。

(四) 美国的公共腐败

根据 1986 ~ 2014 年的 TRAC 数据，可以对各州公共腐败定罪进行排名（增加了非联邦法院确定的其他案件）。表 3 描述了每一个州如何根据四种不同的测量公共腐败的标准进行排名（从最不腐败到最腐败）。在第一列中，根据各州人均腐败定罪总数对州进行排名。第二列省略了对私人的定罪，并根据政府官员的定罪总数占政府在该州的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对各州进行排名。最后，根据州、地方官员或仅仅是州官员中被定罪的人数与州和地方或州政府的雇佣人数的比例对各州进行排名。

表 3 1986 ~ 2014 年州排名 (1 = 最不腐败)

州	所有人 (人均)	政府 (每个 全职员工)	州和地方 (每个 全职员工)	州 (每个 全职员工)
阿拉斯加州	47	42	19	14
阿拉巴马州	30	22	38	38
阿肯色州	19	21	24	34
亚利桑那州	18	29	11	31
加利福尼亚州	22	32	15	29
科罗拉多州	7	9	2	6
康涅狄格州	21	31	30	40
特拉华州	39	38	29	20
佛罗里达州	28	35	28	30
佐治亚州	29	30	31	36
夏威夷州	43	40	42	33
爱荷华州	1	1	1	1
爱达荷州	2	3	16	9

续表

州	所有人 (人均)	政府 (每个 全职员工)	州和地方 (每个 全职员工)	州 (每个 全职员工)
伊利诺伊州	20	23	40	476
印第安纳州	13	13	33	12
堪萨斯州	8	6	6	3
肯塔基州	31	33	39	48
路易斯安那州	46	46	45	43
马萨诸塞州	42	43	41	41
马里兰州	33	24	25	28
缅因州	17	17	23	32
密歇根州	15	19	27	18
明尼苏达州	9	10	12	11
密苏里州	24	26	34	25
密西西比州	49	48	48	50
蒙大拿州	50	50	50	16
北卡罗来纳州	6	4	10	24
北达科他州	48	49	46	7
内布拉斯加州	12	11	13	17
新罕布什尔州	11	14	3	2
新泽西州	45	47	47	39
新墨西哥州	26	15	20	26
内华达州	14	27	26	27
纽约州	44	44	37	44
俄亥俄州	27	25	32	19
俄克拉荷马州	32	28	35	45
俄勒冈州	5	7	4	8
宾夕法尼亚州	36	41	44	37
罗得岛州	40	45	49	46
南卡罗来纳州	35	34	21	35
南达科他州	25	20	14	4
田纳西州	38	39	36	42
得克萨斯州	16	16	17	23

续表

州	所有人 (人均)	政府 (每个 全职员工)	州和地方 (每个 全职员工)	州 (每个 全职员工)
犹他州	10	8	7	5
弗吉尼亚州	41	37	18	21
佛蒙特州	23	18	22	15
华盛顿州	3	2	5	10
威斯康星州	4	5	8	13
西弗吉尼亚州	37	36	43	49
怀俄明州	34	12	9	22

注：FTE = 相当于全日制。

从各个方面来看，爱荷华州是最廉洁的州。科罗拉多州、堪萨斯州、俄勒冈、犹他州和华盛顿州（爱达荷州、明尼苏达州、新罕布什尔州和威斯康星州都有很好的排名）在每项指标中都排在前十位。排名靠后的州对所调查的具体指标更为敏感；然而，按每项指标衡量，密西西比州始终是最腐败的州之一。所有排名都属于倒数前十的州有路易斯安那州、马萨诸塞州和罗得岛州（夏威夷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和西弗吉尼亚州都有不光彩的历史）。

长期以来，伊利诺伊州一直是公共腐败的代名词，但这些排名显示，虽然伊利诺伊州和地方官员相对腐败，但当包括联邦官员时，该州的排名就会有利。蒙大拿州和北达科他州正好相反，在只考虑州官员的腐败问题时，这些州的排名才很低。

讨 论

本文论证了在美国关于公共腐败原因和后果的经验文献中，最常用的公共腐败衡量标准基于的是有严重缺陷的数据。司法部公共廉政处对公职人员的定罪缺乏记录，内部不一致，包括低级别联邦官员，如邮政雇员。在1995年之前，由于这段时间被包括在大多数使用PIN数据的

腐败的实证研究中,因此 PIN 数据的累积失败尤其是有问题的。

此外,在许多应用中,来自 PIN 数据的腐败定罪总数被用作衡量国家官员腐败程度的依据。然而,国家官员只占有腐败定罪的一小部分。此外,在联邦法院被定罪的州官员所犯的(更严重的)罪行与联邦官员不同。

综上所述,这表明学者们应该从早期使用 PIN 数据的研究中汲取教训,并用来自 TRAC 的改进数据对旧问题进行重新审查。例如,从这两个来源测得的在每个政府就职的州年定罪数之间的相关性仅为 0.29,而从 TRAC 测得的在每个州政府就职的州官员定罪数与 PIN 测量之间的相关性仅为 0.13。这有力地表明,以前基于 PIN 数据的经验结果可能无法使用更详细和可靠的 TRAC 数据进行再生。例如,Leeson 和 Sobel (2008) 在分析 PIN 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挑衅的说法,即联邦灾难援助导致了公共腐败的增加。然而,Cordis 和 Milyo (2015) 表明,一旦使用关于定罪的 TRAC 数据代替 PIN 数据,该主张的证据就消失了。考虑到州年度观测中 PIN 和 TRAC 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很低,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重新审视其他研究的发现,尤其是使用 PIN 数据来衡量公共腐败。

更积极的是,TRAC 提供的关于联邦腐败起诉的行政记录对未来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这些数据可以分解到被告一级,因此可以通过转介、定罪或处罚来分析官员腐败。此外,官员腐败案件可以很容易地按指控类型、官员类型和地理区域进行细分。

当然,在研究公共腐败时,行政记录并不是万能的。联邦起诉是腐败的一个不完全代表,原因有两个。首先,并非所有的腐败案件都在联邦法院审理。第二,联邦检察官在追查官方腐败或某些类型的腐败案件上的热情度可能有所不同。

关于第一个问题,一些学者认为,绝大多数腐败案件都在联邦法院起诉。对 TRAC 数据和新闻报道的调查表明,这种说法是合理的,因为联邦检察官追查了 94% 以上的腐败定罪。然而,不可能为这个百分比

设立一个下限。

关于检察工作，州年度观察结果表明定罪与监禁判决之间的高度相关性（针对全部定罪和仅针对州官员的定罪而言）减轻了检察官在腐败定罪时可能用数量和质量代替的担忧。然而，学者们应该警惕检察机关在确定腐败定罪方面的潜在内生性。

尽管存在这些担忧，但腐败定罪是公共腐败的一个非常普遍的话题。来自 TRAC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数据揭示了学术文献和大众对腐败的评论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例如，涉及联邦层面官员的腐败案件相对较少，但仍有少数涉及民选或高级官员个人。此外，联邦雇员犯下的罪行类型不同于非联邦官员犯下的罪行类型，并且具有较短的平均刑期。毒品指控和选举犯罪（包括竞选资金违规）在腐败犯罪中极为罕见。此外，尽管公众对政客和政府普遍不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公共腐败的定罪数量并没有增加。最后，州排名揭示了腐败案件的地理分布；至少在某些情况下，选择不同测量腐败的标准可能会影响特定州在排名中的位置。即使是这些基本的经验教训也清楚地表明，联邦行政部门提供的关于腐败起诉的记录对未来关于公共腐败的原因和后果的实证工作是一种有益的帮助。

致 谢

感谢理查德·博伊兰（Richard Boylan）慷慨地提供了他的数据，以及从司法部获取记录的建议。也非常感谢乔治梅森大学墨卡特斯中心（Mercatus Center at 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支持，包括梅根帕特里克（Megan Patrick）的研究援助。

参考文献

Adsera, A., Boix, C., & Payne, M. 2003. "Are you being serve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and

- quality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 (2), 445 – 490.
- Alt, J. E. , & Lassen, D. D. 200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s and corruption in American stat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5 (3), 341 – 365.
- Alt, J. E. , & Lassen, D. D. 2008. “Political and judicial checks on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American State Governments”, *Economics & Politics*, 20 (1), 33 – 61.
- Alt, J. E. , & Lassen, D. D. 2014. “Enforcement and public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the American states”,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30 (2), 306 – 338.
- Baraldi, L. A. 2008. “Effects of electoral rules,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corruption on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consumption spending: An Italian regional analysis”, *The B. 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8 (1).
- Basinger, S. J. 2013. “Scandals and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in the post-Watergate era”,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6 (2), 385 – 398.
- Berkowitz, D. , & Clay, K. 2006. “The effect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on courts: Evidence from the American state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35 (2), 399 – 440.
- Biddle, D. R. , & Lounsbury, E. 1990. “Barr used cocaine, briefs say Guida lawyer names Ex-Thornburgh aide”, *Philadelphia Inquirer*. http://articles.philly.com/1990-07-15/news/25895919_1_cocaine-henry-g-barr-richard-l-guida.
- Boylan, R. T. 2004. “Salaries, turnover, and performance in the federal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7 (1), 75 – 92.
- Boylan, R. T. , & Long, C. X. 2003. “Measuring public corruption in the American States: A survey of state house reporters”, *State Politics & Policy Quarterly*, 3 (4), 420 – 438.
- Brunetti, A. 1997. “Political variables in cross-country growth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11 (2), 163 – 190.
- Campante, F. R. , & Do, Q. 2014. “Isolated capital cities, accountability and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US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 (8), 2456 – 2481.
- Castillo, M. , Petrie, R. , Torero, M. A. , & Viceisza, A. C. 2014. “Lost in the mail: A field experiment in crime”, *Economic Inquiry*, 52 (1), 285 – 303.
- Cordis, A. S. 2009. “Judicial checks on corru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s of Governance*, 10 (4), 375 – 401.
- Cordis, A. S. 2014. “Corruption and 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spen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Finance Review*, 42 (6), 745 – 773.
- Cordis, A. S. , & Milyo, J. 2013. “Do state campaign finance reforms reduce political corruption?” (Mercatus Center Working paper) . Fairfax, VA: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http://mercatus.org/sites/default/files/Milyo_Campaign_FinanceReforms_v2.pdf.
- Cordis, A. S. , & Milyo, J. 2015. “Don’t blame the weather: Federal natural disaster aid and public corruption” (Mercatus Center Working Paper). Fairfax, VA: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http://mercatus.org/sites/default/files/Cordis-Disaster-Aid-Corruption.pdf>.
- Cordis, A. S. , & Warren, P. L. 2014. “Sunshine as disinfectant: The effects of stat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laws on public corrup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15, 18 – 36.
- Corporate Crime Reporter. 2004. “Public corru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Retrieved from

- <http://www.corporatecrimereporter.com/corruptreport.pdf>.
- Corporate Crime Reporter. 2007. “Public corru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rporatecrimereporter.com/news/200/2007/10>.
-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08. “Fact sheet: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public corruption efforts”, Retrieved from http://www.justice.gov/archive/opa/pr/2008/March/08_ag_246.html.
- Depken, C. A. , & LaFountain, C. L. 2006. “Fiscal consequences and public corrup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tate bond ratings”, *Public Choice*, 126 (1), 75 – 85.
- Dincer, O. 2008. “Ethnic and religious diversity and corruption”, *Economics Letters*, 99 (1), 98 – 102.
- Dincer, O. , Ellis, C. J. , & Waddell, G. R. 2010. “Corrup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yardstick competition”, *Economics of Governance*, 11 (3), 269 – 294.
- Dincer, O. C. , & Fredriksson, P. G. 2013. *Does trust matter? Corrup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Edmond J. Safra Working Paper, No. 28)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Retrieved from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34485.
- Eckert, T. 2006. “Cunningham’s list appalling, they say. San Diego Union-Tribune”, Retrieved from <http://legacy.utsandiego.com/news/politics/cunningham/20060222-9999-1n22duke.html>.
-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N. D.). “Public corrup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bi.gov/about-us/investigate/corruption>.
- Fisman, R. , & Gatti, R. 2002. “Decentralization and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U. S. federal transfer programs”, *Public Choice*, 113 (1), 25 – 35.
- Fisman, R. , & Svensson, J. 2007. “Are corruption and taxation really harmful to growth? Firm level evidenc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3 (1), 63 – 75.
- Fredriksson, P. , List, J. , & Millimet, D. 2003.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inbound US FDI: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7 (7 – 8), 1407 – 1430.
- Glaeser, E. L. , & Goldin, C. 2006. “Corruption and reform: Introduction”, In E. L. Glaeser & C. Goldin (Eds.), *Corruption and Reform* .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3 – 22.
- Glaeser, E. L. , & Saks, R. E. 2006. “Corruption in Americ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0 (6 – 7), 1053 – 1072.
- Goel, R. K. 2014. “Packing a punch: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 and corruption”, *Applied Economics*, 48 (11), 1161 – 69.
- Goel, R. K. , & Nelson, M. A. 1998. “Corruption and government size: A disaggregated analysis”, *Public Choice*, 97 (1), 107 – 120.
- Goel, R. K. , & Nelson, M. A. 2007. “Are corrupt acts contagiou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9 (6), 839 – 850.
- Goel, R. K. , & Nelson, M. A. 2011a. “Measures of corruption and determinants of US cor-

- ruption”, *Economics of Governance*, 12 (2), 155 – 176.
- Goel, R. K. , & Nelson, M. A. 2011b. “Government fragmentation versu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corruption”, *Public Choice*, 148 (3), 471 – 490.
- Goel, R. K. , & Rich, D. P. 1989. “On the economic incentives for taking bribes”, *Public Choice*, 61 (3), 269 – 275.
- Gordon, S. C. 2009. “Assessing partisan bias in federal public corruption prosecu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3 (4), 534 – 554.
- Guilty plea in city’s hired truck scandal. 2005. *Chicago Tribune*. http://articles.chicagotribune.com/2005-04-06/news/0504070006_1_hired-truck-program-mail-fraud-charges.
- Gupta, S. , de Mello, L. , & Sharan, R. 2001. “Corruption and military spending”,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7 (4), 749 – 777.
- Gyimah-Brempong, K. 2002. “Corrup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Africa”, *Economics of Governance*, 3 (3), 183 – 209.
- Hessami, Z. 2010. “Corruption and the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Evidence from the OECD countries” (MPRA Working Paper No. 25945), Munich, Germany: University of Munich. Retrieved from https://mpra.ub.uni-muenchen.de/25945/1/MPRA_paper_25945.pdf.
- Hill, K. 2003. “Democratization and corruption: Systematic evidence from the American state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31 (6), 613 – 631.
- Johnson, N. D. , LaFountain, C. L. , & Yamark, S. 2011. “Corruption is bad for growth (even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Choice*, 147 (3), 377 – 393.
- Kaufmann, D. , Kraay, A. , & Mastruzzi, M. 2010. “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Methodology and analytical issue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543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Retrieved from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MACRO/Resources/WPS5430.pdf>.
- Kushner, A. B. 2010. “Is Louisiana the most corrupt state?” (*Newsweek*), <http://www.newsweek.com/louisiana-most-corrupt-state-69541>.
- Lambsdorff, J. G. 1998.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briber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10 (1), 40 – 59.
- Lambsdorff, J. G. 2003. “How corruption affects persistent capital flows”, *Economics of Governance*, 4 (3), 229 – 243.
- Leeson, P. T. , & Sobel, R. S. 2008. “Weathering corrup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51 (4), 667 – 681.
- Leite, C. , & Jens, W. 2002. “Does mother nature corrupt? Natural resources, corru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G. T. Abed & S. Gupta (Eds.), *Governance, Corruption, & Economic Performance*.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p. 159 – 196.
- Lewis, N. A. 1991a. “Ex-aide to Thornburgh convicted of drug count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1991/02/08/us/ex-aide-to-thornburgh-convicted-of-drug-counts.html>.
- Lewis, N. A. 1991b. “How cocaine brought lowing of a soaring law career”, *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1991/02/24/us/how-cocaine-brought-low-a-soaring-law-career.html>.

- Li, H. , Xu, L. C. , & Zou, H. 2000. "Corrup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Economics and Politics*, 12 (2), 155 – 182.
- Long, S. B. , Roberge, L. , Lamicela, J. T. , & Murugesan, M. 2004. "Balancing data quality against time and money constraints: Tricks from the trenches", Proceedings of the 29th Annual SUGI Conference. Cary, NC: SAS Institute. Retrieved from <http://www2.sas.com/proceedings/sugi29/094-29.pdf>.
- Maciag, M. 2012. "Which states have the highest public corruption convictions? See how your state compares to others. Governing", Retrieved from <http://www.governing.com/blogs/by-the-numbers/state-public-corruption-convictions-data.html>.
- Maddigan, N. 2013. "Arrests of 3 mayors reinforce Florida's notoriety as a hothouse for corruption", *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13/09/02/us/arrests-of-3-mayors-reinforce-floridas-notoriety-as-a-hothouse-for-corruption.html>.
- Marsh, B. 2008. "Illinois is trying. It really is. But the most corrupt state is actually..." , *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08/12/14/weekinreview/14marsh.html> .
- Mauro, P. 1995. "Corruption and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 (3), 681 – 712.
- Mauro, P. 1996. The effects of corruption on growth,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MF Working Paper WP/96/98) .
-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auro, P. 1998. "Corruption and the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9 (2), 263 – 279.
- Maxwell, A. E. , & Winters, R. F. 2005. "Political corruption in America" (Working Paper), Hanover, NH: Dartmouth University. Retrieved from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372.2930&rep=rep1&type=pdf>.
- Meier, K. , & Holbrook, T. 1992. "I seen my opportunities and I took 'em: Political corruption in the American States", *Journal of Politics*, 54 (1), 135 – 155.
- Meier, K. , & Schlesinger, T. 2002. "Variations in corruption among the American States", In A. J. Heidenheimer & M. Johnston (Eds.), *Political Corruption: Concepts and Context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pp. 627 – 644.
- Murphy, K. M. , Shleifer, A. , & Vishny, R. W. 1993. "Why is rent-seeking so costly to growth?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 (2), 409 – 414.
- Nice, D. C. 1983. "Political corruption in the American states",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11 (4), 507 – 511.
- Nye, J. S. 1967. "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cost-benefit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1 (2), 417 – 427. Program Category (n. d.) . Retrieved from <http://tracfed.syr.edu/help/codes/progcode.html>.
- Rose-Ackerman, S. 2002. "When is corruption harmful?", In A. J. Heidenheimer & M. Johnston (Eds.), *Political corruption: Concepts and context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353 – 371.
- Shleifer, A. , & Vishny, R. W. 1993. "Corrup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 (3), 599 – 617.

- Simpson, D. , Nowlan, J. , Gradel, T. J. , Zmuda, M. M. , Sterrett, D. , & Cantor, D. 2012. “Chicago and Illinois, leading the pack in corruption”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and Public Affairs Anti-Corruption Report No. 5) .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Retrieved from http://pols.uic.edu/docs/default-source/chicago_politics/anti-corruption_reports/leadingthepack.pdf.
- Swaleheen, M. 2011. “Economic growth with endogenous corruption: An empirical study”, *Public Choice*, 146 (1-2), 23-41.
- Tanzi, V. , & Davoodi, H. R. 2002. “Corruption, public investment, and growth”, In G. T. Abed & S. Gupta (Eds.), *Governance, Corruption, & Economic Performance* .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p. 280-299 .
- “Teacher gets probation after bribery charges. 2007”, *St. Augustine Record*. http://staugustine.com/stories/010407/state_4314726.shtml.
- Transactional Records Access Clearinghouse. (n.d.) . “About the data”, Retrieved from <http://trac.syr.edu/data/jus/eousaData.html> .
- Treisman, D. 2007.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from ten years of cross-national empirical research? ”,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0, 211-244.
- Wile, R. 2013. “Ranked: The most corrupt states. Business Insider”,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most-corrupt-states-and-territories-2013-9> .
- Wilkerson surveillance photos. 2008. Boston Globe. Retrieved from http://www.boston.com/news/local/massachusetts/gallery/10_28_08_wilkerson_surveillance?pg=4 .
- Zorn, M. 2010. Blagojevich trial tape transcripts, text version. Chicago Tribune. Retrieved from http://blogs.chicagotribune.com/news_columnists_ezorn/2010/07/text.html.